

故乡是个文化村

樊茂枝

在老家山阴，人们谈起我的故乡安荣乡大羊村时，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说：那是个文化村。

文化是一个村庄的根脉和灵魂，贯穿于如血管经络般的街巷胡同里，贯穿于人们良好的行为习惯中，贯穿于历朝历代所涌现出的众多乡里乡亲的声名故事里。我的故乡就是这样—一个值得人们念念不忘、交口称赞的好地方。

说故乡是个文化村，是因为故乡的村容村貌里蕴含并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故乡何时建村，因无史料记载，已无法考证。而在清代的《云中府志》所载之明朝《朔州防务图》中，“羊圈头堡”已赫然在列。这便确凿地证明了早在五、六百年前的明代，故乡已成了名村重堡。当时的一村四堡，直到我少小时仍可见端倪。东堡、西堡已成了街道名称；北堡则至今尚可见一个堡墩；南堡除了北面堡墙之外，其余东、南、西三面堡墙虽有残缺，仍高不可攀。说故乡是羊圈头堡，名副其实。村庄的形制以当街为中心，向东南西北四面延展，前街、后街近乎平行，全村通畅顺直，即使是大院落、南巷廊等小街小巷，也都直南直北。这种形制，若无一个良好的乡规民俗、文化根底，想来是难以形成的。不仅如此，村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先后建起了寺庙（佛寺）、龙王庙、关帝庙（村人叫老爷庙）和供奉天官、地官、水官的三官庙等几座大庙。大庙的偏殿中附建有财神庙、土地庙、奶奶庙、孤魂庙等。一进村的麻堰塄上还相背建有玉皇庙、魁星庙，四个村口各建一个五道庙。前街的麻家院前建有一个又高又大的节孝牌楼，一个小山小村建有四堡十庙一牌楼，与村内鳞次栉比的民居相映成辉，在全县也极为少见。

近几年来，国家更投资建设了乡村公路、文化广场、休闲长廊、观景凉亭等等设施，进一步提升了故乡的文化氛围，增加了村民宜居的舒适度、幸福感。

说故乡是文化村，还因为故乡有悠久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。小时候在老家放牛，记得见村中里吉、麻两个人大人家老坟的碑记中显示，有人生前曾是庠生（科举制度中府、州、县学生员的别称），是否有贡生（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，由府、州、县学推荐到京都国子监学习的人）记不清了，但确有廪生（明清两代称由府、州、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，补助生活的生员）。而在村内，一些高门大户人家门楼子的山墙上，几乎都贴有大幅的红底金字“报单”（旧时取得秀才以上功名及民国年间高小以上学生毕业时的“报喜单”），虽然时日久远，早已斑驳，但主人家却从不清理，由此显示家里是曾出过“文化人”的。

解放后，村上对文化教育顺势应势，更有了长足发展。村里开办小学，没教室，学校就设在旧庙上，用禅房做教室；没桌凳，学生坐土炕，从各家各户带自己的小炕桌做起了书桌；没粉笔，师生就自己用石灰和白黏土合起来捏成小粉棒儿代替。就这样因陋就简，一天也没耽搁地办起了学堂。而且很快，就把单班小学发展成了复式小学、完全小学，进而办成了国家认可的正规初中。1958年，村里还试办起了民办高中班。所有这些不仅大大方便了本村学生入学，邻村孩子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村人培养子女求学上进步是成了风气。1949年3月，“晋西北雁北中学”甫一成立，除师范生外，中学只招了一个班，我们村一下就考进了四个学生。这在全县，或许在雁北全区也绝无仅有。再后来，山阴一中则成了村上学子们瞄准的重点学校。记得有一年山阴一中开学的那天，村里一个个背着行李来到县里上学的学生鱼贯而出，有乡亲来了兴趣，扳着手指数一数竟有29人之多。由此可见，村上重教之风多么炽烈。

说故乡是个文化村，更由于故乡培养出了众多优秀的“文化人”，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。比如，曾经国家的重点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吉佩祉；四川成都县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王俊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早期的第一位厂长吉佩祉……这些都是大羊村人。再以我家为例，我们这个姓氏在大羊村属单门小户，仅伯父和我们两家。但父母亲和伯父母均远见卓识，自己省吃俭用、艰苦奋斗，硬是把我们亲叔伯弟兄姊妹8个一个个全都先后送进了中等以上学校里，毕业后参加了工作。到现在，连我们的下一代在内，两家两代人中有中级以上学术职称的即达28人。其中高级工程师1人，高级经济师2人，高级工程师3人，注册咨询工程师1人，国外（南非）会士1人，警监1人，副研究员2人。行政级别是一门四地师、两家七县团。若连子女们的配偶在内，是一门五地师、两家十县团。

细说起来，村里各家各户培养出来的有文化、有能耐的人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例如：王珍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行行长、审计厅厅长；郝耀山获高级经济师与高级商务师职称，在日期间先后被派往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商务处、中国驻尼泊尔、斐济、挪威、爱尔兰等国大使馆商务处工作，历任随员、副领事、一秘（相当于参赞）等职务；吉韶然曾任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大兴安岭林业学校校长、党委书记；麻全士曾是石家庄机械工程学院工程师（技术6级、正师级）；吉继甄曾是太原重机设计院、太重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……再往后，还有到日本、加拿大等国留学就业的，成了故乡的“海派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毕业于原南京药学院（现中国药科大学）的吉卯祉，后就职于北京中医药大学。他编辑的《有机化学》《有机化学习题及参考答案》《有机化学实验》等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、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；编辑的《药物合成》，是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，供药学、中药学、制药学、生物制药学等专业用。他还曾参与完成多项教育部及国家级科研项目，为家乡争得了荣光。

故乡杰出的“文化人”其实还有很多。听说有一年高考，全村光二本以上学生，一下就考上19人。

愿故乡“文化村”的美名长盛不衰，越来越响。

高士英先生寻宝记（下）

●殷培续

地指示王经理，马上找来五名女工，交由高老统一指挥，帮助翻检，从而大大加快了进度。

女工们一件一件地翻，高老目不转睛地盯，生怕漏掉“大鱼”而成千古遗憾。为不耽误时间，高老自掏腰包，中午从街上购回便饭，席地坐在废品堆上和工人一起用餐。连续奋战两天两夜，小山似的废品堆翻了个底朝天，丝毫也没有发现剑尖的影子，深感遗憾。小小挫折并未挫伤高老寻宝的积极性，他丝毫没有半点厌倦，坚信自己的诚心定能再次感动天地。

临走时高老再三感谢张主任的鼎力相助，感激收购部的全力配合，反复叮嘱库房保管员，人出库时千万留意剑尖，以免遗失。从此高老成了县供销社废品收购部的一名“常客”，隔三五就来库房“上班”，星期天更是全天候“蹲点”，风雨无阻，阴雪不挡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期盼——

奇迹再现

1984年8月12日，奇迹真得又一次出现。

这天，高老清早起来出门锻炼，只见温馨的小院里那棵枝头挂满累累果实的小树上，飞来两只喜鹊，尾巴一撇一撇，“喳喳”地叫个不停，高老也没在意。当他轻揉太极一个小时返回院子，觉得很奇怪，这还花喜鹊不叫还在，竟然绕着他的头顶飞来飞去，叫得更欢了。他进门对老伴说：“日怪了，时常不见个喜鹊，今天咱院里的喜鹊长时间驻盘旋，叫个不停。”老伴脱口而出：“喜鹊叫，贵客到，昨晚我梦见太原他舅舅回来呀，可能是托梦来了……”

这天正好是星期天，高老吃过早饭，和往常一样来到废品收购部“上班”，正好遇上小平易供销社送来一车废品，快要卸完，高老马上蹲下来仔细翻拣，结果很快就从一堆铜器里拣出疑

似要寻找的残片，他将信将疑地从腰间皮包里掏出那柄断剑一对，严丝合缝，破剑重圆。只见高老激动得像个小孩似的，喜出望外，手舞足蹈……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泪花倾注着高老的点点滴滴心血；这泪花记录着高老一路寻宝的曲折艰辛；这泪花饱含着高老热爱文物、护佑国宝的殷殷浓情。高老心想，真是应验了老伴昨晚的梦，只不过梦的主人公由“贵客”变成了“瑰宝”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，1984年8月12日，找到剑尖的今天，正好是1983年8月12日找到残剑的那天。两年同一天，破剑获重圆，奇中堪称奇，险中真见险。真是初心永恒，天道酬勤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为感谢一年来帮他寻找剑尖的收购部工作人员，更为了庆贺破剑重圆，珠联璧合，高老慷慨解囊，中午在县城最高档的静远楼饭店设宴庆功，邀请收购部的几名工人和好友聚餐。大家满面春光，其乐融融，盛赞高老先生永不言弃的可贵精神。席间猜拳行令，推杯换盏，热闹非凡。高老在饭桌上当下表示，鉴定结果到手，无论几品几级都要无偿捐献给国家，充分表现了高老无私无畏的——

高风亮节

高老凭他渊博的文史考古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始终认定两柄宝剑不同凡响，但毕竟未经权威部门鉴定不能妄下定论。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寻找鉴定渠道。正好省文物考古部门，在即将开展的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发掘汉墓，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，在胡德平书记的带领下，赴朔指导文物发掘。

高老会同县文化局长雷云贵带着两柄残剑，找到胡书记给他看，胡德平接过残剑一边认真端详，一边细听高老叙述两剑出土地点和曲折经历，并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情况。听了高老的详细介绍，看了残剑，初步断定为战国晚期

剑，属国家贵重文物无疑，并答应过几天带回北京帮助修复，会同有关专家作出准确鉴定，得出结论。

胡书记对高老热爱文物事业，历经艰难抢救国宝的义举给予高度评价，提倡大力弘扬高老这种热爱文物、抢救国宝的高尚精神。高老心里热乎乎的，倍感欣慰，表示在有生之年要继续发挥余热，为文物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。

两个月后，胡德平再次来朔指导考古，随身带来了修复后的两柄宝剑和《专家鉴定书》，确认为战国剑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根据两剑出土地点、造型、材质、工艺、铭文记载认定：一柄为战国晚期的春平侯剑，一柄为相乐宝剑，均为国家一级文物。这次两剑在朔首次发现，对研究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理、军事、兵工技术、铸造水平、镌刻工艺、书法艺术等有着特殊重要意义。同时，他建议高老写成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。

高老得知这一结果真是心花怒放，再次表示将无偿捐献国家。目前这两柄宝剑陈列在北京西博物院，为镇馆之宝，并多次在北京、南京、浙江等地展出。高老撰写的《朔县赵家口发现战国剑》一文于1989年发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《考古与文物》第三期上。

我国大思想家荀子《劝学》“锲而不舍之，朽木不折，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的名句，是对高士英先生不图名、不图利、不怕苦、不怕累，志存高远、百折不挠抢救国宝的爱国行为的最好诠释。如今高老虽已驾鹤西行，但他这种可贵精神和高尚情怀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，并发扬光大。

谨拟打油小诗一首，对高老表示深切地缅怀和崇高的敬意，愿在天之灵有所感悟。诗曰：

废品引来看古迹，大捞捞针堪称奇。
国宝现世閃闪亮，铜剑合璧熠熠辉。
汗水浇灌花儿艳，心血换来果枝累。
老牛何惧夕阳短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

朔州民族交融文化专辑选登（四）

辽天祚帝被俘地“余睹谷”今址蠡测

盛极一时的辽国，在天祚帝时期，朝纲大乱，苍生不安，女真部族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抗辽人暴政。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，金兵已占领辽国大部版图。穷途末路之时，天祚帝最终被俘。但是，有关其被俘地，史书记载不一。例如：

《辽史》卷30《天祚皇帝纪四》载：保大五年（1125）“二月，至应州新城东六十里，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获。”

《金史》卷3《太宗纪》载：天会三年（1125），“二月壬戌，娄室获辽主于余睹谷。”

《金史》卷70《习安传》载：“与娄室俱获辽帝于余睹谷。”

《金史》卷72《娄室传》载：“其后复袭辽帝于余都谷，获之。赐铁券，惟死罪乃宥之，余罪不问。”

《金史》卷72《海里传》载：“从娄室追及辽主于朔州阿敦山，辽主从数十骑逃去，娄室遣海里及术得往见辽主，擒之使降。辽主已穷蹙，待于阿敦山之东，娄室因获之，赏海里金五十两、银五百两、帛四百匹、锦三百两。”

早在保大四年（1124）的时候，天祚帝不甘心大势已去，以兵3万由夹山（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阴山）出发，企图抢占被金人夺去的西京道。此时，包括朔州、应州在内，早为金人所占。但是面对金兵，天祚帝毫无胜算，部众很快败溃。大势已去的天祚帝，由今天的右玉、平鲁南下，计划归依宋国，而随行的高僧以及参谋则建议投降女真。



关于天祚帝在朔州“阿敦山之东”被俘的记载，其实无误。当时，金兵已在朔、武等州布下天罗地网，天祚帝被迫向东逃亡。而不管是在朔、武等州以东，还是“阿敦山之东”，必定是应州方向。《北征纪实》载：“遂禽虏其后妃、诸子、宗属，独天祚逃去不见。乃于朔州、武州境上即时分兵，每三十里百骑，顷刻布三百里以待之。果有一人驰骏马，手牵二马望北驰去，骑兵围之，即下马，因自言曰：‘我天祚也。’”

这样，应州“余睹谷”这个地名，基本能判定是天祚帝被俘之地。从读音与书写来看，“余睹谷”应该是辽语，但也有学者猜测或是人名。查史书，辽2《耶律余睹传》载：“耶律余睹，一名余都姑，国族之近者也。”民国《马邑县志》卷1《輿图志》载：“旧志云金主执辽延禧处。案宣和二年（1120），辽都统耶律余都（旧作‘伊睹’）叛降金，则余都本人名，非谷名。六年（1124），辽延禧至武州，与金人战，败走朔州。七年

（1125）正月，金兵逼辽主，遣至干桑乾河，遂入夹山，败奔突厥。二月，至应州，金将洛索获之以归。今不知谷所在，或因余都至而有是名耶？”耶律余都身为叛将，怎敢以自己名字命“余睹谷”？以上猜测大约不符合史实。

也有人认为“余睹”是哈名，在山阴。雍正《山西通志》卷21《山川》载：“余睹谷，在（山阴）县南。宋宣和七年（1125）二月，党项小斛禄迎辽主延禧。辽主趋党项，又为金兵所获，遂走应州，至余睹谷，金娄室执之以归。余睹谷，在（山阴）县南。宋宣和六年，辽主与金于奄遁于水下海，师溃，走山阴，居此。”山阴大约没有“余睹谷”这样的地名，作者对此也是猜测，志书其他地名多载距县城里数，独“余睹谷”、“余睹谷”简略记述在“县南”。

那么，这个“余睹谷”是在“应州新城东六十里”还是“应州西”呢？乾隆《应州续志》卷1《方輿志》猜测：“则余睹谷当在今（应州）西山口一带，而所云‘新城’更在其西也。《云中志》谓在（应州）南山……”

我们知道，天祚帝在朔、武等州被辽兵击溃后，向东面的山谷逃亡，在降宋与降辽之间犹豫不定，为防被辽兵追及，自不会在马邑川、神武川等平行之地行军。所以不管是应州东还是应州西，本不是天祚帝一行逃亡路线。安全起见，天祚帝必须藏身在应州南面绵延数百里的大山与深谷之间，而且还要不停地转移。

应州南30里有一个“护驾岗”，地近茹越口。万历《应州志》卷1《地理志》记载：“故老相传，魏孝文帝驻蹕于此，因以立名。”这个“护驾岗”的得名，应该是护卫天祚帝而来，金兵与辽人在此曾发生激战。试想，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为北魏京师，在“护驾岗”这样的近畿之地驻蹕，孝文帝怎会担心大敌来犯，要大量士兵护驾呢？而只有天祚帝在逃亡之时，虎落平阳，随从极少，在茹越口附近被金兵追及，随从天祚帝忠心耿耿的士卒与金兵交战，极力反抗。战斗中，天祚帝趁机孤身由茹越口南下，在今天的“榆东沟”再次被金兵追及，被迫投降。

今天的应县方言，“榆东沟”与“余睹谷”读音相近，“榆东沟”或是数百年之后民间所改。这个“榆东沟”，地处应县城南60里，或许就是天祚帝被俘之地。又或是应州与繁峙相邻，繁峙古代地名常以“沟”为名，依据道光《繁峙县志》卷2《建置门》，繁峙具有大沟村、小沟村、塔西沟、泉沟村、石塔沟等近70个村名带有“沟”字。或许应州文化、民俗也被其影响，所以改“谷”为“沟”，“余睹谷”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“榆东沟”。

辽朝极盛时，曾在应州城内建造

宝宫寺释迦塔（应县木塔）。为筑巨塔，必要运送大型工程机械，而应州城门狭小，无法通过。后唐时的彰国军为中等方镇，州城的建制也无法与历史悠久的大同城相抗衡。《新五代史》卷48《尹晖传》载：“尹晖‘从废帝入洛阳，而晋高祖来朝，与晖遇于道。晖时犹为严卫指挥使，特先降阶，不为高祖屈，马上辘轳揖之。高祖怒，白废帝晖不可与名藩。乃以为应州节度使。”尹晖本是后唐末帝李从珂麾下功臣，为报答尹晖，李从珂一早应许让其管理邺都（今河北大名县东北）。但后来大将石敬瑭认为尹晖无德无礼，反对赐予其名藩大镇，李从珂遂让尹晖担任彰国军节度使，令尹晖十分怨望。看来这一时期的应州，建城时间很短，虽是后唐明宗李嗣源家乡，但州城大小以及城门等次，还是中等方镇级别，不会太大或太高。

这样，为及时运送器械、木料，建好宝宫寺释迦塔，大约在辽道宗时期对应州城也有所改筑，所以应州城有了“新城”之名。

过去，谈及“新城”，很多人习惯性地想起新平城、梵王寺古城等等，这种看法不一定对。“新城”与“旧城”相对，从本义来看，新建造的城均能被称为“新城”。例如，王忠嗣在担任河朔节度使时，曾将大同军城移至云州城，又多有增修，之后的云州城就有了“新城”之名。例如，1986年在今大同市城东的曹夫楼出土了一方墓志，名为《唐故定襄郡定襄府果毅都尉安定梁君墓志》。志主梁秀，葬地为“新城之东原”，下葬时间为天宝七年（748）三月二十五日。墓志出土地曹夫楼，正好在御河东岸，东距大同古城约五里，符合墓志所记“新城之东原”。此处的“新城”，就是云州城或大同军城。

“榆东沟”在茹越路，距离大宋代州繁峙县界很近。看来矛盾的天祚帝在逃亡时仍不能决定是降金还是降宋，所以在宋金界山中无所适从。

据成化《山西通志》卷7《景致》记载，应州古八景有“赤崖夕照”，在州东南茹越口。但是，穷途末路的天祚帝已无心去欣赏附近的风貌人文。江山易主，朝代改姓，本是天道常理。天祚帝不禁往北望向应州城内的宝宫寺释迦塔，这座塔曾承载了祖宗的功业与梦想。但大雪茫茫，释迦塔的影子目力已不能及。雪上尽是战马的蹄印，追兵很快将至。或许终于承认天辽气数已尽，天祚帝长叹一声，转身向金兵的方向走去……

三年后，天祚帝在孤苦、绝望中病逝。余睹谷，或许也就是今天应县的榆东沟，宣告了辽亡金兴，成为民族交融发展演变过程中，一个关键性的转折。

刘冬

转自《朔州文博》2023年第3期



大爱无疆



泰献



初心为艰

曹子文 刻

投稿邮箱:szrbfk@126.com



胡进作